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华佛教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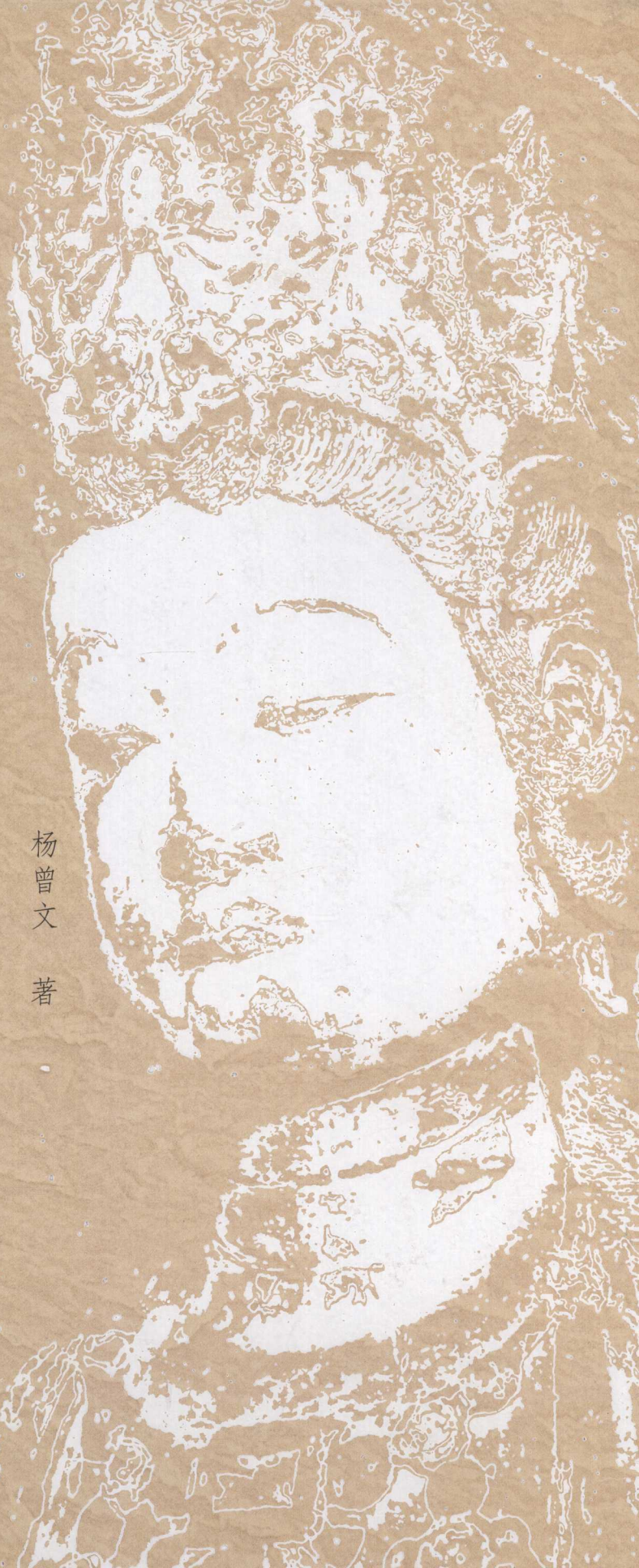


总主编
季羡林
汤一介

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

杨曾文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014007260

B949.2
49
V10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华佛教史

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

杨曾文 著



B949.2

49

V10

总主编
季羨林
汤一介



北航

C1694148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0351003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佛教史. 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 / 季羨林, 汤一介主编; 杨曾文著. --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40-5901-5

I. ①中… II. ①季… ②汤… ③杨… III. ①佛教史—中国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3061号

书 名 / 中华佛教史·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
作 者 / 杨曾文

出 版 人: 荆作栋

总体设计: 崔元和

编辑主持: 雷俊林 刘立平 郭志强

责任编辑: 杨 文 唐 锋

复 审: 郭志强

终 审: 刘立平

装帧设计: 薛 菲 李斌岳

印装监制: 郭 勋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472980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93千字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5901-5

定 价: 66.00元

《中华佛教史》总序

◎季羨林

此丛书名曰《中华佛教史》，为什么我们不按老规矩，称此书为《中国佛教史》呢？用意其实简单明了，就是想纠正一个偏颇。我们惯于说中国什么史，实际往往就是汉族什么史。现在改用“中华”这个词，意思是不止汉族一家之言，而是全国许多个有佛教信仰的民族大家之言。

谈到中华佛教史，我们必须首先提到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书取材丰富，分析细致，确是扛鼎之作，已成为不朽的名著。但是，人类社会总是在不停地前进，学术也是日新月异，与时俱进。到了今天，古代西域（今新疆一带）考古发掘随时有新的考古材料出土，比如，吐火罗语就是在新疆发现的，过去任何书上都没有这种语言的记载。所以我们感觉到，现在有必要再写一部书。

在中国古代佛教的著述中，有几种实际上带有佛教史的性质，比如《佛祖历代通载》等。佛教以及其他学科而冠以史之名称（如文学史之类），是晚近才出现的，其中恐怕有一些外来的影响。

近代以来，颇有几种佛教史的著作，这些书为时代所限，各有短长，我在这里不一一加以评论。

我们现在有胆量写这一套中华佛教史，就是为了赶上学术前进的步伐。

总而言之，归纳起来我们这套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我们不只说汉族的事情，也介绍我国其他有关的少数民族的情况；第二，我们对古代西域佛教史的发展有比较详细的论述；第三，现在写这部书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两千多年的

演变，最终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佛教仍然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中国人民不管信佛教与不信佛教的，都必须了解佛教的真相，这会大大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了解。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中外互相了解，全世界都互相了解。

我是不信任何宗教的，但是，对世界上所有的堂堂正正的宗教，我都有真挚的敬意。因为这些宗教，不管它的教义是什么，也不管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些宗教总是教人们做好事，不做恶事，它们在道德上都有一些好的作用。因此，现代世界上，宗教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专就佛教与中国而论，佛教的原生地印度和尼泊尔，现在佛教已经几乎绝迹，但在我们中国，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原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大度包容。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达到今天这样如火如荼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有这种特点。从当前世界来看，我们最近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概念，这就希望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互相了解，互相促进，共同达到人类社会更高的层次。

所以，我们研究佛教写佛教史，不但有其学术意义，还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华佛教史》

总主编

季羨林

汤一介

◆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卷》 张雪松

◆ 《隋唐五代佛教史卷》 洪修平

◆ 《宋元明清佛教史卷》 魏道儒

◆ 《近代佛教史卷》 麻天祥

◆ 《佛教文学卷》 孙昌武

◆ 《佛教美术卷》 金维诺

◆ 《西藏佛教史卷》 王尧

◆ 《云南上部座佛教史卷》 张公瑾 杨民康 戴红亮

◆ 《中韩佛教交流史卷》 魏常海

◆ 《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 杨曾文

◆ 《佛教史论集》 季羨林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日本古代的社会和佛教传入日本	5
第一节 佛教传入前的日本社会及其宗教文化	5
第二节 佛教传入日本	13
第二章 隋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和日本圣德太子“兴隆三宝”	21
第一节 隋朝佛教概况	22
第二节 圣德太子的新政和遣使赴隋沟通中日邦交	25
第三章 唐代中日佛教交流及中国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上)	42
第一节 唐代的社会和佛教	42
第二节 “大化革新”以后的日本佛教	47
第三节 中日佛教交流和日本奈良六宗	60
第四节 鉴真和尚东渡和日本律宗	86
第四章 唐代中日佛教交流及中国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下)	106
第一节 平安时代的社会和佛教	106

第二节	最澄入唐求法和日本天台宗	110
第三节	空海入唐求法和日本真言宗	126
第四节	最澄、空海以后的日本入唐求法僧	148
第五节	圆仁和日本天台宗	163
第五章	宋元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和日本净土宗禅宗传入日本	174
第一节	弥陀净土信仰在日本的传播和源信的《往生要集》	175
第二节	日本的净土宗、真宗和时宗	186
第三节	临济宗在日本的早期传播——所谓“兼修禅”及其代表人物	214
第四节	临济宗在日本的兴盛——所谓“纯粹禅”及其代表人物	241
第五节	日本临济宗主流派的奠基人——应、灯、关	267
第六节	道元和日本曹洞宗	278
第七节	日莲和日莲宗	296
第六章	明清时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和日本黄檗宗的创立	316
第一节	明至清初中日两国的社会和佛教文化交流	316
第二节	隐元东渡和黄檗宗	330
参考文献	356
《中华佛教史》后记/汤一介	361

自序

1999年6月15日，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了以季羨林教授、汤一介教授为主编的《中华佛教史》编委会首次会议，对全书指导思想、分卷、章节、进度计划及编写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等进行了讨论，初步达成共识。我承担全书的“中国佛教外传卷”的日本国部分。此后三四年间编委会又举行过三次会议，决定将我承担的部分作为单独一卷，名之为《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

然而笔者因为手头尚有已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禅宗史》的撰写任务及其他工作，一直没能集中时间和精力撰写此卷。笔者在2001年初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退休，但撰写《宋元禅宗史》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直到2005年12月笔者刚刚过完六十六岁生日方将此书写完，此后才有较多时间投入撰写《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老年科研基金资助研究课题，2003年12月笔者有幸将《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申请立项并得到资助。在这期间，主编汤一介教授、山西教育出版社皆曾来电询问本书进展情况，这实际是对笔者的一种催促。笔者心中虽然负疚着急，然而一不能赶进度仓促从事，二又兼有其他日常繁杂事务必须处理，于是断断续续，直到2008年4月才告完成。

日本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移植和发展。6世纪中期日本从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佛教，此后大量日本僧人到中国学习佛法，回国后将汉译佛经和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传入日本，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僧人到日本传法。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六个佛教宗派，平安时代（794—1192）天台、真言二宗，皆是从中国直接传入的，而进入镰仓时代（1192—1333）以后在吸收和继承中国佛教的基础上形成带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宗派——净土宗、真宗、时宗、日莲宗。这些佛教宗派的创始人是参照并发挥汉译佛典和中国佛教著述建立教义理论和宗派的，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特殊形态。在这个时期也从宋元传入禅宗临济宗、曹洞宗。中国佛教在传入并经历日本民族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推动作用。

本书旨在阐明中国佛教东传日本的过程、中日佛教的源流关系。全书共30万字，分以下六章：

一、日本古代的社会和佛教传入日本

佛教传入前的日本社会和公元6世纪（一般认为在538年）中国佛教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情况。

二、隋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和日本圣德太子“兴隆三宝”

日本推古天皇时期担任“摄政”的圣德太子派使者出使隋朝，正式建立两国邦交关系并派学僧数十人前来学习佛法，拉开两国正式佛教文化交流的序幕。此后佛教在日本迅速传播，促使社会上层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吸收，推动日本政治、文教制度的革新。

三、唐代中日佛教交流及中国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上）

中国佛教概况及其在日本早期传播，奈良时期盛行佛教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为以后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鉴真东渡的动人事迹及其在日本佛教文化史的贡献。

四、唐代中日佛教交流及中国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下）

中国天台宗、密宗的创立及教理体系。最澄、空海入唐求法，回国后分别创立日本天台宗、真言宗。继最澄、空海之后，日本人唐求法僧圆仁、圆珍及常晓等人入唐求法概况。

五、宋元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和日本净土宗禅宗传入日本

汉译佛教净土信仰的经典和中国的净土思想。佛教净土思想传入日本；平安后期净土信仰的兴起，源信所著《往生要集》及其影响；源空创立日本净土宗；亲鸾创立真宗。中国禅宗临济宗、曹洞宗的代表人物及禅法思想。宋元时期临济宗和曹洞宗传入日本，在幕府和武士阶层乃至朝廷权贵的支持下得到迅速传播。日本禅僧荣西、圆尔、道元及中国禅僧兰溪道隆、正念、祖元等人在日本传法情况。日莲创立日莲宗及其特色。

六、明清时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和日本黄檗宗的创立

在明代日本以“进贡”名义与明朝开展的勘合贸易中，担任正使、副使入明的几乎全是禅僧，他们也顺便从事佛教交流活动。明清之际，临济宗高僧隐元隆琦（1592—1673）应请赴日传法，在临济、曹洞二宗之外创立了黄檗宗，同时也将明清文化介绍到日本。

其中第三、四、五章是全书的重点，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篇幅。

笔者过去已经撰写出版过《日本佛教史》，现在又按照《中华佛教史》编委会的规划撰写《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那么应当如何取材，着重考察和撰写哪些方面的内容呢？笔者经过思考，归纳出以下五点：1. 以“中国佛教”作为主体，用主要篇幅考察介绍中国佛教及诸宗概况、中国佛教如何传入日本及在日本早期传播的情况，而对它在日本实现本土民族化演变为“日本佛教”的过程仅作概要介绍；2. 注意考察在中国佛教东传日本过程中两国僧人对中国佛教的着眼点、态度的差异及其传播的重点、所起的作用；3. 揭示中国佛教在日本佛教史的初期、中期和后期的不同地位与影响；4. 中国佛教在整体上对日本佛教乃至历史文化所产生的影响；5. 通过史实论述表彰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两国重要人物。按照这种意图来写，虽然在一些重要内容的介绍中难免与笔者以往的《日本佛教史》的内容有交叉乃至相同之处，然而因为考察视角及论述重点有所不同，在学科建设上可以丰富“中国佛教”外传史的内容，充实以往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推进对中日古代佛教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助于中国读者加深对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之间佛教和文化交流的了解，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仅对从事中日友好活动和两国文化交流工作、日本历史和思想文化的研究者有参考价值，而且对在大专院校开设日本语言、历史和文化的课程

及对日本宗教文化感兴趣的社会一般读者也有参考价值。

因为笔者在撰写此书期间没有机会到日本做专题研修或考察，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日本研究著作了解不多，参考得较少，从而影响对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吸收。并且由于自己的学识水平和写作能力的限制，在全书结构、内容和段落语句表达等方面肯定存在不少不妥乃至错误之处，谨望读者发现并不吝赐教。

第一章

日本古代的社会和佛教传入日本

日本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古代社会文明虽然起步较晚，然而由于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先进文化的影响，发展速度很快。在漫长的中日两国彼此交往和文化交流过程中，佛教曾起过重要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6世纪中叶前后开始传入日本的佛教，曾长期对日本社会政治和文化发挥重大作用，成为日本古代最有影响的宗教。同时，中国的儒家学说对于日本的政治、文化教育、宗教和日本民族道德伦理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为论述方便，笔者首先根据中国史书和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佛教传入以前的日本社会和宗教文化情况作概要介绍，然后对佛教传入日本进行介绍。

第一节 佛教传入前的日本社会及其宗教文化

一、日本自然环境和早期历史概况

日本是个岛国，由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四个大岛和近四千个小岛组成。

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与中国、韩国、俄罗斯为邻，东临浩瀚的太平洋。早在几万年以前，日本原与亚洲大陆连接在一起，大约在一万多年以前，由于地质和自然气候的巨变，才逐渐形成与大陆隔离的日本列岛。

日本国拥有很长的海岸线，港湾很多。境内多山，山地约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大小火山数量达二百多座，最高山峰是海拔 3776 米的圆锥形活火山富士山。河谷交错，河流湍急，水量充沛。日本的气候属温和湿润的海洋季风性气候，除本州北部和北海道冬季比较寒冷外，其他大部分地区四季常青。耕地较少，但宜于种植水稻等农作物，森林和渔业资源丰富。

早在两万多年以前，当日本土地尚未完全从亚洲大陆分离的时候，日本人的祖先已开始在这里栖息生活。从公元前 1 万年至公元前 2 世纪前后，人们主要靠采集、狩猎和捕鱼为生。因为所使用的陶器带有绳纹，史学界称这个历史时期为绳纹时期。

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中，受到来自隔海相望的大陆国家中国、朝鲜的影响很大。随着日本与大陆国家交往的逐渐频繁，大陆的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日本，大约在公元 1 世纪又从大陆传入青铜器、铁器，并在此后日本民众学会制造和使用金属工具。日本史学界把从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的历史时期称为弥生时期（因反映这一时代文化特征的陶器在东京弥生町发现，故以“弥生”命名）。在这一时期，日本开始进入阶级社会。

据中国史书记载，公元一二世纪以后日本出现一些部落和部落联盟国家。东汉班固（32—92）《汉书·地理志》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所谓“乐浪海”^①即指日本的濒临日本海及东海一带；“倭”指日本。据此，汉时日本有百余国，并且有的已经与中国建立联系。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遣使自称大夫奉献，光武帝赐以印绶。此印 1784 年在九州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上书“汉委奴国王”。三国时约有三十余国与魏朝之间有使节往来，如西晋陈寿（233—297）《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所载：“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大约在进入二三世纪以后，相继在日本九州北部兴起邪马台

^①据《汉书·地理志》，汉武帝时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玄菟、乐浪二郡。乐浪郡治在今朝鲜平壤，所谓乐浪当指朝鲜半岛南部一带的海域。

国，在本州西南部（以今奈良为中心）兴起古大和国。^①

考古证明，三四世纪在以畿内的奈良、大阪一带为中心的全国各地，陆续建造了以前方后圆为特征的高大古坟，埋葬着各地国王、部族首领的遗体和大量丰富奢侈的陪葬品。以此为标志，日本进入了古坟时期。在各个小国中，大和国最为强盛，通过对外兼并扩张，大约在公元4—7世纪逐渐统一了日本。

二、从邪马台国、大和国看早期日本社会

1. 邪马台国

在中国古代《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及《宋书》《梁书》等史书中，对早期日本都有记述，然而记述最详细系统并且对后世史书相关记载影响较大的是《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的《倭人传》。此传对二三世纪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日本社会概貌及宗教文化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

西汉武帝时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玄菟、乐浪二郡。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平壤，负责处理韩、倭事务。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东汉末辽东太守公孙康分乐浪郡的屯有县置带方郡（治所在今朝鲜黄海北道沙里院南），此后韩、倭事务皆归带方郡负责。倭国不仅与带方郡府经常往来，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入朝也须通过带方郡府。

邪马台国距设在朝鲜半岛的带方郡约一万两千里。如果沿着西侧海岸南行，经过分布于朝鲜半岛西南部、东南部及对马海峡、九州的约八个小国（有的是以岛为国），始到达邪马台国的国都。这些小国实际是些部落或部落联盟，大小不一，然而皆设官分职，有的仅有人口千余户，大者如奴国有两万余户，投马国有五万余户，邪马台国人口最多，有七万余户。此外，在邪马台国的周围还有二十一个小国。这些小国大部分皆统属于邪马台国，组成一个较大部落联盟性质的地域国家，中国史书称之为“倭国”。因为当时邪马台国的国王是位名卑弥呼的女性，因此中国史书也称邪马台国为“女王国”。

原来邪马台国也是以男子为国王，在公元2世纪后期倭国发生内乱，彼此攻

^①关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是在九州还是在奈良的大和，邪马台国是否就是大和国，中日两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请参考汪向荣、夏应元编的《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第10页对“邪马台国”所作的注。赵健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以邪马台与大和国为前后形成的不同地域国家，邪马台国在九州北部，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伐，历年没有国王，众人便将一位年长未嫁，善于“事鬼道，能惑众”的女子卑弥呼拥戴为王。^① 卑弥呼身兼国王和祭司，除执政外，还“事鬼道”，即主持全国的宗教祭祀事务，居处有“宫室楼观”，戒备森严。女王让其弟辅佐她处理政事，下面设立行政官员四级，又在附属于邪马台国的伊奴国置相当汉朝刺史的“大率”一人，负责“检察诸国”和保护、监督过往的使节官员；又派称做“大倭”的官员，负责管理各国贸易。

按照日本历史分期，邪马台国形成于弥生时代后期，已进入贫富等级悬殊的阶级社会。史书记载，在邪马台国，“宗族尊卑，各有差序”，居民有“大人”、“下户”和“奴婢”的等级差别，民户要缴纳租赋。国有刑法，犯罪者要受严厉处罚，“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卑弥呼女王死后，建造直径百余步的大墓安葬，殉葬奴婢多达百余人。这种情况可从在北九州考古发掘的弥生后期的一些巨大坟墓得到佐证。这些巨墓的陪葬品中有铜镜、铜剑、铜戈及玉器等，有的数量很大。

邪马台国在卑弥呼死后，又立男王，因为国人不服，发生内乱，互相残杀千余人，直到拥立十三岁的卑弥呼宗女壹与为国王，国内才安定下来。至于以后邪马台国情况，史书无载，据说是被在大和兴起的大和国攻灭了。^②

邪马台国与魏朝有着密切往来。魏明帝景初三年（239）、魏齐王正始四年（243），卑弥呼女王先后两次派使者到洛阳朝廷奉献生口（奴隶）、锦帛等礼品，魏帝赐以“亲魏倭王”之号及大量贵重礼物，并授使者以“率善中郎将”等。带方郡守也曾奉诏到邪马台国拜女王以“假倭王”（暂署倭王）之称号。在壹与即位后，也曾派使者入魏奉献。可以想见，邪马台国在与中国的密切交往中是不断接触并吸收中国文化的。

2. 大和国

古大和国大约在3世纪以后于近畿地区（今奈良、大阪、京都等地）兴起，与在北九州的邪马台国一样是个较部落联盟性质的地域国家，政治中心在大和（在

^①中国史书对卑弥呼国王的记载虽详略不同，但内容大致相同，然而关于卑弥呼被立为国王的时间，《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没有记载，成书于南朝宋的范晔《后汉书·东夷传》却有明确记载，谓：后汉桓帝、灵帝之间（147—189），倭国大乱，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被立为主”。

^②赵健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章第二节之二谓：4世纪末古大和国统一了东日本的群馬县至神奈川一带，并西至九州，邪马台国灭亡。

今奈良南部)。大和国随着自身的强大,不断向外兼并扩张,到4世纪前半期不仅统一了北九州,而且扩展到本州的关东地区(今东京都及神奈川、埼玉、千葉、群馬、栃木、茨城等县)。

大和国(也称“倭”、“倭国”)在统一北九州后,渡海侵入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当时朝鲜半岛北方有高句丽,南部有百济、新罗及任那、秦韩、慕韩等国。据现存中国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国第十九代王“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391—412年在位)的墓碑,即《广开土王碑》或《好太王碑》的记载,大和国在391年渡海战败百济(碑称“百残”)和新罗,强迫这两国向它称臣进贡。此后,大和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金官伽耶,今洛东江口一带)作为它在朝鲜扩张的基地,又联合百济与高句丽对抗。396年(丙申),高句丽好太王率军队打败百济,逼它归服高句丽。然而在399年(己亥),百济违约,联合大和国军队攻打新罗。新罗王派使者向高句丽求救,好太王派五万军队打败大和军队,收复新罗,并一度攻下任那城。404年(甲辰)大和国派兵北上进犯带方故地,遭到高句丽军队的重创而溃败。^①直到6世纪后期,大和国的军队才被赶出朝鲜半岛。^②

大和国在进入5世纪以后与中国南朝的交往十分密切。在位主持与南朝使节往来的是著名的“倭五王”:赞、珍、济、兴、武,日本学者认为他们就是成书于8世纪的《日本书纪》中的仁德(或应神)、反正(或仁德)、允恭、安康、雄略五位天皇。他们先后十二次派使者到南朝奉表进贡,求封官爵,以巩固在日本的统治地位并谋求对朝鲜半岛南部诸国的控制权。例如赞王去世后,弟珍即位,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请求宋文帝正式任命,然而文帝仅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并同意授予他提名的其他十三人的将军封号。齐高帝建元元年(479)诏除倭王武(雄略天皇)以“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即位,又进

^①耿铁华:《好太王碑新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不同侧面对高句丽好太王碑作了详细考察和说明,可以参考。

^②参见日本坂本太郎著,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二章第三节。